

刘庆柱 著

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

科学出版社

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

刘庆柱 著

科学出版社

2000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FORBIDDEN CITIES AND MAUSOLEUM
IN ANCIENT CHINA**

Liu Qingzhu

Science Press

2 0 0 0

内 容 简 介

本文集选编了刘庆柱先生的中国考古学研究论文共 30 篇, 主要内容
包括中国考古学研究综述、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秦文化及秦都咸阳遗
址、汉长安城与汉代帝陵考古学研究和战国秦汉瓦当研究等。全书重点论
述了秦汉都城、帝陵陵寝的布局形制及其渊源与流变; 系统阐明了秦汉瓦
当的分区、分期。

本书可供从事历史、考古、文物、古建筑、美术史工作者, 大专院校
师生及历史、文物、考古爱好者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刘庆柱著.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ISBN 7-03-008648-1

I. 古… II. 刘… III. ①都城: 古城-研究-中国-文集②陵墓-考古-研
究-中国-古代-文集 IV. K87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4177 号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源海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0 年 7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00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3 3/4 插页: 1
印数: 1—1 800 字数: 489 000

定价: 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杨中)

2000. 8. 30

提借准备书

自序

这本论文集主要收集的是我在秦汉都城和帝陵考古研究方面的论文。这些论文大多是结合我的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课题撰写的。

70年代我参加并主持秦咸阳城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其间对秦咸阳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勘探，重点发掘了秦咸阳宫的大型宫殿遗址，在此基础上我撰写了《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论秦咸阳城布局形制及其相关问题》和有关秦咸阳城出土陶文、壁画等方面的研究文章。

80年代中期以来，我承担了汉长安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课题，开展了对未央宫、长乐宫、桂宫和东市、西市勘探，对未央宫、桂宫和陶俑窑遗址、铸币遗址、冶铸遗址等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获得了大量重要考古资料，整理、编写、出版了考古发掘报告《汉长安城未央宫》（1996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反映上述考古研究成果的论文主要是《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纪念汉长安城考古工作四十年》、《汉长安城未央宫布局形制初论》、《汉长安城桂宫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汉长安城的宫城和市里布局形制述论》等。《汉长安城布局结构辨析——与杨宽先生商榷》和《再论汉长安城布局结构及其相关问题——答杨宽先生》两篇论文是我利用汉长安城及其他古代都城遗址的考古资料，就汉长安城及中国古代都城形制所涉及的一些问题，与杨宽先生进行的学术讨论文章。

90年代后半叶，我写了《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古代宫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和《关于中国古代宫殿遗址考古的思考》，阐述了我对这些重大学术问题的观点，探讨了有关古代都城、宫城、宫殿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方法和理论问题。

汉唐帝陵考古曾是我70年代和80年代前期非常关注的学术课题，当时对汉唐帝陵进行过较为系统的考古调查，并重点勘探和发掘了汉宣帝杜陵陵园、寝园遗址等。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专著《西汉十一陵》，后又译成日文，以《前汉皇帝陵的研究》之名在日本出版。整理、编写、出版了考古发掘报告《汉杜陵陵园遗址》（1993年，科学出版社）。本书所收的《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和《汉宣帝杜陵陵寝建筑制度研究》等文章，是这一时期西汉帝陵考古研究课题的部分成果。

在秦汉都城、帝陵陵寝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遗物，我选择了有关瓦当和骨签研究的6篇文章收录在本文集中。《五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和《秦汉考古学五十年》则是我对新中国建立以来半个世纪中国考古学和秦汉考古学发展的回顾与新世纪学科发展的展望。

本文集的有些论文填补了某些研究领域的空白，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秦咸阳城范围与布局，西汉帝陵陵园、寝园布局形制，汉长安城及其未央宫的布局结构，秦

汉瓦当的断代和使用功能,古代都城、宫城、宫殿布局形制发展变化特点及相互关系等。对都城遗址、古代瓦当考古研究的一些方法和理论问题,相关论文也进行了认真探索。

以上介绍了本书收入的主要文章写作背景和基本内容,它们反映了我的部分学术研究活动。最近在整理这些文章中,深感其中有些文章虽然其论点、论据也还算站得住脚,但并不令我满意,考虑到这是历史,而历史我们要尊重,所以除极个别因技术上的原因之外,我对各篇文章均未作改动。

这本书中有些文章是我和我的夫人李毓芳合作撰写、发表的。多年来她一直与我共同进行秦汉都城与帝陵考古学课题的研究。我的这些论文都凝集着她的心血和汗水。

在本论文集的编辑过程中,姜波同志翻译、陈星灿先生、吕烈丹女士校对了论文集英文目录和英文内容提要,李森先生、韩慧君女士清绘了线图,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谢意!

2000年4月9日

目 录

五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	(1)
秦汉考古学五十年	(10)
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25)
中国古代宫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36)
关于中国古代宫殿遗址考古的思考	(48)
试论秦之渊源	(56)
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	(62)
论秦咸阳城布局形制及其相关问题	(70)
秦都咸阳“渭南”宫台庙苑考	(85)
《谈秦兰池宫地理位置等问题》几点质疑	(90)
秦都咸阳遗址陶文丛考	(94)
试谈秦都咸阳第三号宫殿建筑遗址壁画艺术	(106)
秦都咸阳第三号宫殿建筑遗址壁画考释	(109)
中国古代的汉王朝	(116)
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纪念汉长安城考古工作四十年	(124)
汉长安城布局结构辨析——与杨宽先生商榷	(142)
再论汉长安城布局结构及其相关问题——答杨宽先生	(152)
汉长安城的宫城和市里布局形制述论	(162)
汉长安城未央宫布局形制初论	(177)
汉长安城桂宫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190)
汉代城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197)
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	(207)
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	(227)
汉宣帝杜陵陵园建筑制度研究	(237)
汉代骨签与汉代工官研究	(254)
战国秦汉瓦当研究	(268)
秦瓦当概论	(302)
秦“十二字瓦当”时代质疑	(321)
汉代文字瓦当概论	(325)
汉长安城遗址及其出土瓦当研究	(339)
ABSTRACT	(364)

CONTENTS

Fifty Years of Chinese Archaeology (1949 ~ 1999)	(1)
Fifty Years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10)
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Ancient Capitals	(25)
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Forbidden Cities in Ancient China	(36)
The Archaeological Study on Remains of Chinese Ancient Palaces	(48)
The Origin of the Qin Culture	(56)
Several Issues on the Capital of the Qin Dynasty—the Xianyang City	(62)
The Layout Pattern of the Xianyang City of the Qin Dynasty and Related Problems	(70)
The Qin Royal Palace and Garden Located on the South Bank of the Wei he River in the Xianyang City	(85)
A Few Questions to <i>The Location of the Lanchi Palace of the Qin Dynasty</i>	(90)
Deciphering the Inscriptions on the Qin Pottery Found in the Xianyang City	(94)
Wall Paintings Found at Palace No. 3 of the Qin Dynasty in the Xianyang City	(106)
Studying the Wall Paintings Found at Palace No. 3 of the Qin Dynasty in the Xianyang City	(109)
The Han Dynasty in Ancient China	(116)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f the Chang' an City of the Han Dynasty and Related Problems —— Commemorating Forty Years of Archaeological Study on the Chang' an City of the Han Dynasty	(124)
A Discussion on the Layout Pattern of the Chang' an City of the Han Dynasty with Prof. Yang Kuan	(142)
On the Layout Pattern of the Chang' an City of the Han Dynasty again —— Answering Questions from Prof. Yang Kuan	(152)
Forbidden City , Markets , and Lanes : the Layout Pattern of the Western Han Capital Chang' an City	(162)
The Layout Pattern of the Weiyang Palace in the Western Han Chang' an City	(177)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Research on the Remains of the Gui Palace in the Western Han Chang' an City	(190)
The Discovery and Research on Remains of the Western Han Cities	(197)
The Survey and Research of the Western Han Royal Mausoleums	(207)
Some Questions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Western Han Royal Mausoleums	(227)

Studying the Architectural Form of the Du Mausoleum Which Buried Emperor Xuan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237)
Bone-labels: the Bureaucracy of the Royal Workshops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254)
Bricks and Tile-ends of the Warring States, the Qin and the Han Dynasties	(268)
A Summary on the Tile-ends of the Qin Dynasty	(302)
Questioning the Date of the “Qin Tile-ends with 12 Characteristics”	(321)
A Summary on the Tile-end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ated to the Han Dynasty	(325)
Remains of the Western Han Chang’ an City and the Unearthed Bricks and Tile-ends	(339)
ABSTRACT	(364)

五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

一、20 世纪上半叶中国考古学的回顾

考古学作为一门严谨的科学，诞生、形成于 19 世纪中叶的欧洲。19 世纪下半叶和 20 世纪初，随着考古学的日趋成熟，除了学科本身的发展之外，它还迅速从欧洲扩及北非、美洲和东亚。在这种形势下，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近代考古学伴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和文化掠夺传入中国。一些国家派遣的考察队，在新疆、甘肃、内蒙古和东北等地的“寻宝式考古”，造成中国文化遗产的极大损失。

本世纪初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历史时期，与此相应的近代学术史也是异常活跃，“疑古”派的兴起，重创了传统史学；1899 年王懿荣等首先发现的殷墟甲骨契刻文字和 1900 年道士王圆箎发现敦煌“藏经洞”的写本经卷、文书，连同随后发现的大量汉晋简牍，使史学研究从“疑古”走向“释古”。以王国维为代表的新史学，利用考古发现，创立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中国考古学萌芽之际的三大发现成为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契机，也使考古学从传到中国伊始，就成为了中国现代学术中的“显学”。

中国学者第一次主持田野考古工作是 1926 年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1928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学组开始的河南安阳殷墟的调查、发掘是我国考古研究学术机构独立进行科学发掘的开始，它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20 年代至 30 年代的北京周口店旧石器遗址大规模发掘和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是世界考古学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等在山东历城城子崖遗址和河南安阳后冈遗址的发掘，辨认出龙山文化及第一次从地层上判定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这是中国史前时代考古研究科学化的重要标志。

二、20 世纪后半叶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半个世纪来，中国考古学学科队伍不断壮大，由掌握田野考古技术的几十人，发展到至今约 3 000 人。从中央到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所属的独立的考古研究机构、考古教学单位已有约 40 个。

50 年来的中国考古学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以田野考古发掘为学科发展基础，重视专题与综合研究，加强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丰硕学术成果，使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逐步建立。

1. 史前考古发现与研究

旧石器时代考古是研究距今 1.2 万年前的人类历史。50 年代以前,我国除北京周口店遗址和山顶洞遗址之外,另有少数几个省仅发现了十几个旧石器文化遗存地点。新中国建立以来,旧石器文化遗存在全国各省、区都已发现。距今 200 万年前后的人类文化遗存在安徽繁昌癞痢山人字洞、重庆巫山龙骨坡和云南元谋上那蚌的发现,对探索在亚洲地区人类的起源有重要意义。这也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目前发现的距今 100 万年前后的人类文化遗存主要有:陕西蓝田公王岭和河北阳原泥河湾等。距今 70 万年以来的直立人文化遗存在北京、山东、内蒙古、辽宁、陕西、甘肃、四川、河南、湖北、安徽、江苏、贵州、湖南、广西等地已发现 150 多处。其中秦岭山脉东部地区的陕西蓝田陈家窝、洛南东河村龙牙洞和湖北郧县学堂梁子的重大发现,显示这里是研究中国早期人类进化的重要地区。作为中国自然地理上的南北方分水岭,这里也表现出旧石器时代“过渡性”的文化特色。早期智人化石及其文化遗存在山西、陕西、辽宁、广东、安徽、湖北、贵州等地已发现 30 多处。距今 4 万年至 1.2 万年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其人类文化遗存在全国各省、区均有发现。50 年来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古人类从直立人到晚期智人,在体质人类学上具有一脉相承的特征,这说明它们是连续不断进化的。由于在我国这样大的地理范围内,各方面自然条件的不同,人们的生活、生产内容也就各具特色。如目前学术界已认识到,旧石器时代我国已形成北方的小石片石器传统和南方的砾石石器传统,改变了以华北旧石器为发展中心的传统看法。上述研究成果,是 50 年来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成就。

50 年来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取得了辉煌学术成果。全国各地发现逾万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对千余处遗址进行了发掘或试掘,一些重点聚落址和墓地进行了有计划的大面积揭露,累计发掘墓葬一万多座,整理出版田野考古发掘报告 30 多部。通过上述工作,全国各主要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系列基本建立。对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农业起源和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等重大学术课题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基础理论与方法进行了不断探索。

距今 12 000 年至 9 000 年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研究,近十多年来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广西邕宁顶狮山、柳州鲤鱼嘴、桂林庙岩、河北徐水南庄头、山西怀仁鹅毛口、北京怀柔转年和门头沟东胡林等地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出土了原始陶器残片、磨制石器、我国年代最早的人工驯养家畜——狗和猪、目前世界上年代最早的栽培稻等。

公元前 7000 ~ 前 5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早在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已经发现,但对其全面、系统的考古学研究是 70 年代后期才开始的。目前在河南、河北、陕西、甘肃、山东、湖南、内蒙古、辽宁、广西等省区,已发现了这类文化遗存约 200 处,如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老官台(大地湾)文化、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后李文化

和北辛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的彭头山文化，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岭南地区的顶狮山和桂林甑皮岩遗存。这时期的先民聚落已有一定规模，聚落周围有壕沟或墙体护围。从当时墓地的墓葬数量来看，聚落及其人口数量，已发展到一定规模。栽培的农作物有粟、黍、稻。由于我国南、北方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这时我国已形成了南稻、北粟的不同农业经济类型。西北部的干旱、高寒地区则为采集狩猎经济。饲养的家畜除原有的狗、猪之外，又发现了牛、羊、鸡等。新出现的玉器、彩陶、白陶等说明了先民手工业的发展。骨笛、陶祖和契刻的龟甲则反映了先民的文化与精神生活。上述诸多重大发现，使人们对这一时期文化发展水平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发现说明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这是我国氏族社会的繁荣时期，其晚段也是中国古代文明逐渐形成时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的发现数量多、分布地域广。根据已发现考古资料揭示，各地的新石器文化有着相当高的发展水平，并按自然地理区域形成了主要以中原地区、海岱地区、长江中游、黄河上游、辽河流域、太湖地区等为中心的格局。对此，考古学界提出了华夏文化多元一体的理论。

大约距今四五千年，也就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晚段，即中国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有的学者认为这就是传说的“三皇五帝”时代。关于这一时期考古发现主要是近年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近 30 座城址、大型祭祀遗迹或遗物，以及一些遗物上发现的原始文字。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历史时期以中原为中心的夏文化，最初形成于“龙山时代”。这也是中国文明的形成时期，即夏王朝诞生时期。90 年代后期以来，不少学者针对当时过分强调多元方面，而提出不能否认中原文化在当时国家诞生前后一段历史时期的中心地位和重要历史作用。

半个世纪来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已基本构建起了中国史前史的框架。由于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史前考古学，使以考古学研究为主体形成的中国史前史资料更为丰富，内容更为详实，科学性更强。

2. 夏商周时期考古发现与研究

夏商周时期考古在中国考古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半个世纪来，其考古发现众多，研究成就巨大，其中夏与商代前期、周边地区青铜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填补了上古历史的某些重要空白，商代和两周城址、墓地的发掘研究成果丰硕。

夏文化的考古工作主要是对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近 40 年的考古勘探、发掘，以及对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研究，对河南登封王城岗、晋南襄汾陶寺等遗址、墓地的发掘与研究。二里头遗址发掘的两座大型殿堂建筑遗址、大面积的铸铜遗址、多座包含丰富随葬品并含朱砂的墓葬，以及大量房址、窖穴、水井、灰坑、祭祀遗迹、中小型墓葬中出土的一些青铜容器、大型玉器和陶质礼器等，确立了这座年代约距今

4 070~3 600年、面积约9平方公里的夏王朝都城遗址性质。

80年代初期河南偃师商城的发现与近十几年考古工作使夏商文化研究获得重大突破。偃师商城由郭城和宫城组成,宫城中南部分布有布局整齐的8座宫殿,北部为池苑。学术界已基本取得了关于偃师商城即汤都“西亳”的共识,因此这也就为夏商王朝的年代分界找到了界标。

另一商代前期都城——郑州二里冈商城的发现,以及其附近郑州小双桥大型商代建筑基址的发掘,增加了对商代前期文化的认识。

商代前期文化的研究,促进了先商文化课题的探索,在豫北、冀南等地都开展了不少这方面的考古工作。与夏商文化年代相近的属于“东夷文化”的鲁中、豫东地区的岳石文化与内蒙古赤峰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都进行了大量田野工作,获得了全新的认识。

50年来安阳殷墟的考古工作一直连续进行,重要发现有武官村大墓、妇好墓和郭家庄160号墓的清理,数以几千枚计甲骨的出土,大量宫殿遗址的发掘、洹北花园庄殷墟早期大型遗址的发现等。以殷墟发掘为基础的殷墟商文化综合研究,取得了全方位学术进展。

商代方国和周边地区考古发现,是商代考古的另一重要收获,其中重要发现有河北藁城台西、湖北黄陂盘龙城、陕西西安老牛坡、河北定州、山东益都苏埠屯、滕州前掌大及山西灵石旌介、江西樟树吴城、新干大洋洲、四川广汉三星堆等遗址或墓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其中尤其是三星堆和大洋洲的发现,改变了过去学术界对商代周边地区文明发展偏低看法。

西周考古以陕西长安的丰镐遗址与岐山、扶风的周原遗址最为重要,自50年代初期以来西周都城丰镐遗址的考古工作,发现西周不同时期墓葬逾千座、大型建筑基址十多座,以及一些青铜器窖藏,这些发现为建立、完善西周考古学编年,打下了坚实基础。1997年在沔西遗址发掘的灰坑,获得了先周与西周分界界标的考古学证据和系列测年标本,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陕西周原遗址的考古工作以西周时代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铸铜、制陶和制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与铜器墓、铜器窖藏的清理,13 922片占卜甲骨的出土最为重要,上述有字甲骨、铸铭铜器对西周史的研究有着极高的学术史料价值。

为了推进对西周文化的研究,从70年代末开展的先周文化探索课题,20年来取得了许多进展,如陕西长武碾子坡、扶风刘家村、武功郑家坡遗址等的勘察与发掘,这些进一步印证了《史记·周本纪》的相关记载。

50年来,西周封国和周边地区的考古发现成绩斐然。重要的有山西曲沃曲村晋国遗址及晋侯墓地,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城址及燕侯墓地的考古发掘。此外,陕西宝鸡的虢国墓地、山东滕州滕国墓地、长清邾国贵族墓地、江苏丹徒和湖北黄陂鲁台山的西周早期墓及四川成都指挥街西周时期蜀文

化遗存等清理,均取得重要考古收获。

东周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要时期,50年来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重点是对列国都城遗址的勘察和重点发掘,对城址附近墓葬的清理。其中以三晋、秦、楚考古成绩尤著。

50年来勘察、发掘工作开展较多的列国都城址主要有秦都雍城、曲阜鲁国故城、临淄齐国故城、新郑郑韩故城、邯郸赵国故城、易县燕下都、江陵楚国纪南城、秦咸阳城、夏县魏安邑城、侯马晋国新田故城和灵寿中山城等。这一时期的墓葬已清理8千多座。50年代对洛阳东周王城及洛阳中州路墓葬的发掘和研究,奠定了中原地区东周考古学的编年基础。已清理的重要东周墓葬有辉县固围村魏墓、太原晋阳故城的赵卿大墓、江陵马山1号墓、荆门包山2号墓和郭店楚墓、浙川下寺楚墓、随州曾侯乙墓、秦景公墓、平山中山国王墓、寿县蔡侯墓、苏州真山大墓、绍兴印山越国王陵,延庆山戎墓、庆阳匈奴墓、固原诸戎墓等。

此外,这一时期还清理了一些重要窖藏与其他遗物,如郑韩故城礼乐器窖藏坑、临淄后李的车马坑,可能为“沁阳石简”发现地的河南温县武德镇出土的万余件石圭石简,侯马晋国盟誓遗址、祭祀坑的清理等。

三门峡虢公墓西周晚期铁器的发现,江西瑞昌铜岭、湖北大冶铜录山、安徽南陵与铜陵、山西中条山等地的铜矿开采、冶铁遗址发掘,山西侯马铸铜遗址、河南西平酒店铁矿开采、冶铸遗址的清理,填补了商周时期金属矿藏开采、冶铸技术史研究的空白。

依据出土的大量商周时期甲骨、有铭铜器和简牍等遗物,开展的先秦文献整理研究,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成果尤为丰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甲骨文合集》(13册)、《小屯南地甲骨》、《殷周金文集成》(18册)和荆门郭店楚简、天水放马滩秦简和湖北云梦秦简等。

3. 秦汉至元明时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秦汉至元明时期的考古研究,伴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而开始。但系统的田野考古工作和有计划的各项专题研究,则是新中国建立之后才蓬勃开展起来的,由此改变了“古不考三代以下”的不合理状况。

50年来这一历史时期考古成果十分丰富,其中以历代都城、帝王陵寝、科技与手工业、边疆、宗教、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考古工作最为重要。上述诸多方面许多重大发现及其研究成果,提供了大量极为重要、科学的史料,填补了学术研究空白,开拓了新的史学研究领域。

这一时期都城遗址开展考古工作较多、研究进展较大的有秦咸阳城、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曹魏及北朝时期的邺城、隋唐两京的长安和洛阳、元大都遗址等,其中汉唐长安城遗址开展的考古工作时间最长、内容最多、收获最为丰富。汉长安城遗址

勘查了城址范围、城门位置及城内主要道路和宫城与“亚宫城”的分布等,50年代发掘了4座城门和宗庙、社稷、辟雍等礼制建筑遗址,70年代发掘了武库遗址,80年代以来全面系统地勘查了未央宫、长乐宫和桂宫布局,确定了北宫、东市和西市的地望与范围,发掘了未央宫椒房殿、少府(或其官署)、中央官署、宫城角楼遗址,试掘了前殿遗址,清理了制陶、冶铸、造币作坊遗址,发掘了桂宫第二号建筑遗址。

隋大兴城唐长安城是中国古代最伟大、最具代表性、最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都城,50年代以来,全面勘探了郭城、皇城、宫城城门、道路、坊市等遗迹,重点发掘了都城正门——明德门、皇城城门——含光门、大明宫宫门——含耀门、圜丘、青龙寺、西明寺、西市、含元殿、朝堂、翰林院、麟德殿、三清殿、清思殿、兴庆宫勤政务本楼遗址等,隋唐都城的重要离宫隋仁寿宫唐九成宫、唐华清宫遗址等均进行了大面积考古发掘。

通过50年来历代都城遗址考古工作的开展,基本究明了秦汉以来中国古代都城形制布局变化,对都城的城门、宫殿、寺庙、礼制建筑、市场、里坊等遗址的结构、特征、渊源与流变等重要学术课题进行了研究,加深了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

半个世纪来的秦汉至宋明时代帝王陵寝考古在社会上和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清理轰动寰宇,成为20世纪世界上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汉景帝阳陵陪葬坑、汉宣帝杜陵陵寝建筑遗址的发掘,河北满城汉墓、广州南越王墓、徐州楚王陵、永城梁王陵等约40多座汉代诸侯王墓的发掘,取得了重大的考古收获。据已见诸报道的其他汉代墓葬考古发掘多达3万座。

三国至明代的帝后陵墓也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勘查,为了配合文物保护工作,对南京的东晋恭帝陵、丹阳和南京一带的南朝齐宣帝永安陵(或齐高帝泰安陵)、齐和帝恭安陵(或齐东昏侯墓)、陈宣帝显宁陵,洛阳北魏宣武帝景陵,磁县湾漳北齐文宣帝武宁陵、咸阳北周武帝孝陵、乾县唐僖宗靖陵、南京南唐二陵、北京明定陵等帝陵进行了考古发掘,此外还发掘了一些王陵,清理了部分帝陵陪葬墓和达官显贵的墓葬。

上述墓葬的考古勘查、发掘,使人们对秦汉以来的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发展史有了较清楚认识。大量墓葬的清理,为编年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各地不同时期古代墓葬的发掘,丰富了相关历史时期物质文化资料,成为了当时社会历史的缩影,促进了对其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研究。

正如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所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材料的)新发现”,考古发现的秦汉至元明时代的简牍、帛书、骨签、文书、经卷、墓志等文献资料,以及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砖雕等形象资料,使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生机盎然,简牍学、敦煌学等新学问纷纷出现,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科学技术对人类历史发展有着极为重要作用,中国考古学者50年来在这一领域开展了大量考古发掘与研究。铁器生产的普及和使用,在古代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历

史作用。冶铁遗址是秦汉考古的重要对象。冶铁业是汉代三大手工业之一，汉代是我国古代铁器普及的时代。对相关的冶铁、铸造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发掘，其中以河南南阳瓦房店、巩县铁生沟、郑州古荥镇和温县招贤村冶铁、铸造遗址最具代表性。这些考古资料反映出这时期发明了铸铁柔化术、块炼渗碳钢，发展了脱碳制钢和百炼成钢等多种技术。东汉以来瓷窑遗址考古所取得的丰硕学术成果，再现了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经大规模考古发掘的重要瓷器生产遗址有：浙江上虞窑、龙泉窑、杭州南宋官窑、江西丰城洪州窑、吉安吉州窑、景德镇明代御制瓷器厂、陕西铜川黄堡耀州窑、河北内丘邢窑、观台磁州窑、河南宝丰汝官窑、福建建阳水吉镇建窑、宁夏灵武窑、内蒙古赤峰市缸瓦窑和湖南长沙窑等。半个世纪来的陶瓷考古，基本上解决了中国瓷器的起源与发展的的问题，对不同窑口的瓷器形态和工艺特点取得了基本认识，在诸如汉代瓷器、越窑秘色瓷、唐青花瓷和三彩器等方面的专题研究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50 年来的秦汉至元明时代墓葬、遗址考古发掘出土了种类繁多、数目惊人的文物，它们极大地促进了纺织（主要是丝绸）、天文、农业与水利、医学、地理、度量衡、金银器、玻璃器等诸多方面的学术研究，为重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进行了开拓性、奠基性工作。

秦汉至元明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时期，半个世纪来秦汉至元明时代边疆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学术成就，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内蒙古、青海、宁夏、山西、河北等地的匈奴墓葬，内蒙古和晋北的鲜卑墓地，云南滇池附近的滇国墓葬，贵州西北部“夜郎”墓葬，四川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新疆奇台汉疏勒城址、民丰尼雅精绝国、和田于阗国、罗布泊楼兰、尉犁营盘等西域诸国和吐鲁番阿斯塔那等地的高昌、突厥遗存及吉木萨尔唐北庭都护府遗址，辽宁桓仁、吉林集安的高句丽城址与王室贵族墓葬，黑龙江宁安县渤海上京龙泉府及黑龙江、吉林的渤海墓葬，青海都兰热水吐蕃墓地，西藏山南藏王墓及洛扎县吐蕃贵族墓地和阿里古格王国遗迹，云南洱海的太和城址、剑川石窟等南诏、大理遗迹，这些考古工作对研究边疆各地少数民族历史及其经济、文化，阐明其与内地悠久的历史关系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秦汉以来的中国考古学，宗教遗址与遗物发掘、清理占有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以来宗教考古取得蓬勃发展，其中以佛教石窟寺和寺院遗址的考古工作成果最为显著。石窟寺考古主要开展了云冈、龙门、莫高窟、炳灵寺、响堂山、天龙山、巩县、克孜尔与库木吐喇、栖霞山千佛岩龕像、新昌宝像寺龕、拉萨扎拉鲁浦等石窟寺考察与研究。在石窟寺分区、石窟寺造像研究和石窟寺遗址发掘等方面均取得了重大学术突破。北魏永宁寺、唐青龙寺、西明寺和高昌回鹘佛寺遗址等的发掘，以法门寺为代表的一批古代佛塔地宫的清理、山东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的出土等，使 80 年代以来的佛教考古在中国考古学上大放异彩。

中外文化交流在中国历史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汉唐王朝曾经被誉为中国古代史上的黄金时代,50年来的考古发现说明,汉唐王朝又是中外文化交流最为突出的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波斯萨珊王朝银币、东罗马金币、金银器、玻璃器、外销瓷、佛教遗物、体质人类学资料等专题的研究,对丝绸之路的考察,揭示出秦汉至元明时代中国与中亚、西亚、东欧、南亚、东亚及至北非地区的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界对中国考古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给以极大关注,它将成为新世纪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热点。

4. 科技考古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近20年来,中国考古学的突出特点是考古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的全方位结合,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使考古学学科发展在“量”和“质”的方面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年代学研究上应用了 ^{14}C (常规和加速器质谱)和热释光断代技术。在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年代测定中广泛使用了考古地磁学、电子自旋共振、铀系法、钾-氩、裂变径迹、氨基酸外消旋法、化学元素分析、穆斯堡尔谱学断代等。这些断代技术的应用是史前考古学的一次革命。 ^{14}C 断代技术的发展、测年误差值的大大缩小,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体质人类学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从死者年龄、性别判定,到人种学的研究、古病理史的探讨,通过食性分析和遗传基因(DNA)的收集,使考古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大大提高。

物质结构和成分分析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工作,80年代以来扫描电子显微镜、穆斯堡尔谱技术、X射线衍射、红外吸收光谱、中子活化分析、离子束分析、X射线荧光分析、原子发射光谱、原子吸收光谱、核磁共振、热分析技术、铅同位素比值研究等已逐渐在考古研究中得到使用。

考古学与气候、地质、植物、动物等学科结合,研究古代的环境问题,是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要求,是人类对环境认识加深的反映,是学科成熟的表现。90年代以来,环境考古学研究已取得可喜成绩。

作为考古学基础的田野考古工作,新技术的使用更为广泛,如考古调查中的勘测工作,使用了遥感、探地雷达、地震面波方法、高精度磁测方法、大地电场岩性探测、地球化学勘探探测汞技术等。至于计算机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其范围越来越广、作用越来越大。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被广泛引进到考古学中,发现了过去考古学研究中不能涉及或忽略涉及的研究方面,极大地加深和拓展了学科研究领域。提高了科研效率,加大了科研工作量的量化成分,提高了科学性。可以预见,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与考古学的更为密切的合作,中国考古学在新的世纪,在其学科理论、方法和学术成果等诸多方面,都将发生重大突破。